

目 录

第十四卷

(一) 金融财税

- 中国通商银行始末 陈泽浩(1)
- 浙江兴业银行兴衰 尚其亮(6)
- 贵州银行概述 袁树三(16)
- 北洋军阀时期的交通银行 韩宏泰(22)
- 记上海交通银行 韩宏泰(32)
- 浙江地方银行始末 洪品成(38)
- 四明银行由商办改为官商合办
的经过 孙鹤皋(52)
- 浙江实业银行 马炳荣(55)
- 中国实业银行的兴衰 李志道(62)
- 我所了解的聚兴诚银行 曹天受(67)
- 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历史概述 吴经砚(72)
- 盐业银行与北洋政府和国民党
政权 张伯驹(96)
- 金城银行简史 徐国懋 邵怡度(111)
- 大陆银行兴衰纪略 谈季桢 谈在唐(117)
- 北四行的联合经营 应永玉(127)
- 侨商中南银行 刘效白(131)
- 东北边业银行始末 韦锡九(135)
- 解放前青海的银行 王殿瑞(144)
- 中央银行的建立及其在上海
的活动 李立侠 朱镇华(148)
- 湖南省银行始末 陈 纪(159)
- 新疆边城银行 柴济森(163)
- 30年代的陕西省银行 李维城(169)
- 我与富滇新银行 缪云台(183)
- 四川省银行内幕一瞥 何兆青(192)
- 复兴银行始末 冯 器(207)
- 我的父亲蒋抑卮 蒋世承(217)
- 徐寄庾一生的金融活动 朱镇华(222)
- 我在中国银行的一些回忆 冯耿光(225)
- 王志莘孙瑞璜与上海新华
银行 吾新民(234)
- 刘鸿生创办中国企业银行 方祖荫(238)
- 王伯元与中国垦业银行 王念祖(242)
- 孔祥熙与中央银行 李立侠(251)
- 宋子文贝淞荪时代的中央
银行 李立侠(264)
- 张嘉璈在中国银行的
22年 洪葭管(271)
- 张公权与中央银行 李立侠(280)
- 我在江苏银行的五个年头 陆子冬(288)
- 归化金融史话 贾汉卿(293)
- 东三省官银号 荆有岩(310)
- 民国时期四川的币制 赵星洲(320)
- 北洋时期的币制 资耀华(326)
- 龙云统治云南时期的财政 孙东明(330)
- 阎锡山在晋绥两省的经济
统制 郭文周(342)
- 国民党的官僚资本见闻 祝世康(347)
- 孔祥熙任财政部长期间的财政
与金融 戴铭礼(356)
- 孔祥熙家族与中央信托局 徐家涵(363)
- 孔祥熙鲸吞美金公债的内幕 陈贻雅(381)
- 国民党政府法币的崩溃 资耀华(385)
- 通货膨胀内幕 朱 侠(390)

抗战期间广西金融…………… 龙一飞(397)
 记上海黄金风潮案…………… 何汉文(401)
 “国统区”重庆的货币与金融… 蒋孟豪(410)
 国民党崩溃前的一次经济

大掠夺…………… 白 丁(414)
 金圆券的发行与崩溃…………… 黄元彬(419)
 美、英、日对国民党政府金融的

控制和垄断…………… 资耀华等(424)
 汉口花旗银行的掠夺…………… 董明藏(437)
 中法储蓄会始末…………… 李文杰(441)
 彩票的由来和演变…………… 双 成(446)
 记上海票据交换所…………… 朱博泉(450)
 记上海证券交易所…………… 许念晖(458)
 中国征信所始末…………… 吴嘉年(467)
 忆联合征信所…………… 李庸宣(470)
 邮政储金汇业局 20 年 …… 陈述曾(473)
 忆福州的侨汇业…………… 陈涤明(480)
 忆有信银庄(侨批局)…………… 芮诒坝(482)
 国民党田赋征实与征借…………… 陈开国(489)
 高秉坊与中国直接

税…………… 谭子薪 张 森(496)
 旧中国的海关…………… 杨 人(506)
 旧中国的江海关…………… 赵晋卿(512)
 浙海关见闻…………… 陈善颐(519)
 旧中国的闽海关…………… 刘崇斌(527)
 阎锡山接管津海关始末…………… 程海鸥(536)
 抗战时期海关内幕…………… 朱 傑(539)
 忆中国保险公司…………… 王化南(554)
 从太平保险公司到太平洋保险

公司…………… 王伯衡(561)
 北京的当铺…………… 高叔平 高季安(567)
 上海的典当业…………… 孙翔云(574)
 天津典当业 40 年 …… 王子寿(581)
 广州的当押店…………… 陈通曾(591)

(二) 洋行买办

英商太古洋行广州分行…………… 莫应湛(600)
 上海法商永兴洋行…………… 陆志濂(610)

天津太古洋行与买办郑翼之… 郑志璋(616)
 天津怡和洋行及其买办

梁炎卿…………… 梁佩瑜(624)
 英商怡和公司广州分公司…………… 黄孝宽(635)
 外国洋行在石嘴山…………… 刘廷栋(640)
 美孚石油公司…………… 苗利华(646)
 美孚石油公司

在四川…………… 王百揆 江维德(650)
 广州美孚火油公司…………… 张 毅(658)
 虞洽卿的一生…………… 许念晖(666)
 英商泰利洋行及其买办…………… 张文骏(679)
 颜料买办周宗良…………… 卢书锡(682)
 广州亚细亚火油公司…………… 胡毓芬(687)
 亚细亚火油公司在重庆的经济

侵略…………… 应社多 彭燧良(695)
 军火买办雍剑秋…………… 雍鼎臣(701)
 我所知道的德士古石油公司… 李定丰(716)
 广州德士古火油公司…………… 郑炳华(722)
 我在德商禅臣洋行的见闻…………… 蒋文伟(731)
 垄断旧中国烟业的英美烟

公司…………… 苗利华(735)
 英美烟公司买办郑伯昭…………… 程仁杰(741)
 福州英商卜内门

公司…………… 余德舜 王东之(752)
 汉口日信洋行的片断…………… 袁范宇(758)
 重庆卷烟市场与英美烟草

公司…………… 杜振华(764)
 德商南京礼和洋行在华经营

军火的活动…………… 丁福成(771)
 桐油买办商义瑞行经营始末… 李景文(782)
 进口人造丝对我国丝绸市场

的影响…………… 沈莱舟(806)
 外商洋行控制的华丝出口…………… 沪民建(813)
 外商垄断下的华茶外销…………… 沪民建(823)
 美国影片商控制广州市场

史实…………… 刘 康(831)

(三) 其他

“工合”运动记述·····	路易·艾黎(837)
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工业合作 运动·····	卢广绵(840)
在工商部和善后事业委员会 工作的回忆·····	张仲鲁(853)
翁文灏与国民政府经济部·····	董赞尧(862)
国民党政府资源委员会 始末·····	钱昌照(884)
资源委员会的技术引进 工作·····	恽 震(890)
国民政府财政部举办专卖事业 的内幕·····	朱 侠(905)
阎锡山家族经营的企业·····	阎子奉(915)

孔祥熙与复兴公司·····	宁赜南(928)
扬子公司的一鳞半爪·····	宋子昂(931)
马步芳经营的“协和商栈” 内幕·····	莫如志(935)
我经营猪鬃 20 余年的回 顾·····	古耕虞(941)
我国名列第三的 1930 年国际 博览会实况·····	田守成(956)
近代黄河后套的开拓者 ——王同春·····	子 罗(961)
威海渔业见闻录·····	毕复侃等(965)
解放前从事蚕丝业改革的 回忆·····	费达生(970)
林果实业家尹福清父子·····	王建志(977)

(一) 金融财税

中国通商银行始末

陈泽浩

1897年(清光绪二十三年)5月27日,中国人自办的第一家银行中国通商银行在上海成立,在中国金融业发展史上,揭开了新的一页。

通商银行从成立到上海解放,共有52年的历史,经历了清政府、北洋政府和国民党政府三个时期。它的掌权人物,早期是盛宣怀,中期是傅筱庵,后期是杜月笙。中国通商银行的业务经营活动就是在他们的支配下展开的。

盛宣怀办银行的企图和主张

早在1870年,盛宣怀就在李鸿章门下为幕僚。1876年,李鸿章派盛宣怀等到上海,会同上海道台冯俊光与英国领事谈判赎回淞沪铁路事宜,取得一定成果,得到李的赏识。这使盛宣怀接触了李鸿章兴办的一些军事工业和民用工业,有些企业还委托盛直接管理或接办。盛在经手向帝国主义借款兴办芦汉铁路(后改京汉铁路)的过程中,意识到要办铁路不能不办银行,要办铁路不能不办银行,还认为“铁路之利远而薄,银行之利近而厚,欲银行铁路并举,方有把握”。因此,他在《请设银行片》的奏折中,提出“非急设中国银行,无以通华商之气脉,杜洋商之挟持。议者谓国家银行,当全发帑本,简畀大官,通行钞票,由部造发,如英法等国财赋皆出入于银行,是户部之外府也”。他还主张银行必须商办,如官办银行和发行官钞必然得不到商民的信任,但是他又想享受国家银行的一些特权,因为没有这些特权,银行是很难维持下去的。因此,在他拟订的中国通商银行最早的公议章程中,明确规定“拟请户部拨存生息公款200万两,以示官商维系,取信中外。开办之初,……准领生息公款100万两”。这都不是单纯的商办了。

资本来源和组织管理

中国通商银行成立时资本额定为500万两,先收半数250万两,于1898年收足。盛宣怀任总办的招商局和电报局分别投资80万两和20万两,占实收资本的2/5。除了这两个局的投资外,盛宣怀名下包括他本人和代其他大官僚如李鸿章等的投资,达73万两,另有北洋大臣王文韶投资5万两。银行的总董中,亦官亦商的张振勋和严信厚也分别投资10万两和5万两。仅以上几笔已达193万两,约占当时实收资本的4/5。初创的通商银行股东极大部分都属于封

建官僚和买办，纯粹商人的投资为数极少。

中国通商银行名为商办，号称“权归总董，利归股商”，实际上却由盛宣怀独揽大权。成立时总行有九个总董，都不是由股东选举产生，而是由盛宣怀个人指派的。这九个总董是：张振勋、叶成忠、严信厚、杨文骏、刘学洵、严滢，杨廷果、施则敬、朱葆三。

通商银行下属各分行设有分董，也都由盛宣怀委派。该行早期设在香港、广州、九江、天津、镇江、汕头、北京、汉口等地分行的分董，全部是清一色的封建官僚。

通商银行的用人办事，“以汇丰为准”，并借重外材，聘用客卿，不仅它的内部章则制度完全仿照英商汇丰银行，而且在总行和重要口岸的分行都用洋人为大班，掌握业务经营上的实权。当时钱庄势力很大，该行又把钱庄中的头面人物，如上海北市钱业会馆的首创人、咸康钱庄经理陈笙郊拉来担任华大班。总行的帐册、簿据等全部用英文记载。为了取得“外滩银行”的地位，该行加入了外商银行同业公会。这种中西结合的管理制度，较之钱庄、票号的管理制度是一大进步。

清政府时期的业务（1897—1911）

辛亥革命前，通商银行的业务情况大体上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扩展阶段（1897—1899年）。该行以上海总行为中心，先后在汉口、北京、福州、天津、广州、镇江、烟台、香港、重庆、汕头等地设立分行，积极开展业务。1897年底存款为262万两，到1899年底上升为397万两。存款主要来自三方面，一是清政府存款100万两，二是官督商办企业如仁济和保险公司、招商局和铁路总公司等的间歇资本，三是代理各地关道拨交款。在资本运用中，首先是贷给外国洋行、中国商号和钱庄。外国洋行与通商银行发生借贷关系的在30家以上，如德国的礼和洋行，英国的祥记洋行、祥茂洋行，美国的茂生洋行、美孚火油公司，日本的公信洋行等，都曾与通商银行发生借贷往来。中国商号经营土布出口向通商银行借款的有十多家，金额达20万两。由于陈笙郊的关系，通商银行从开办的第一天起，就对钱庄拆款，最高时达249万两。1897年11月，上海金融业发生贴票风潮，钱庄倒闭亏累很多。盛宣怀看到这种情况，不得不改弦易辙，压缩对钱庄的拆放，改做有抵押品的工商业贷款。通商银行成立初期，上海开设了五家民族资本的棉纺厂，其中大生、大纯和裕源三家与通商银行发生借款关系，该行在客观上对支持近代工业的发展起了一定的作用。

第二阶段是萎缩阶段（1900—1904年）。各地分行的分董或经理，不是候补道台，就是当地豪绅、退职官僚，这些人把银行视为衙门，官气十足，造成业务混乱，弊窦丛生。1902年天津分行华大班梁景和经手的呆滞放款达62万两，其中属于舞弊性质的有18万多两。1903年镇江分行华大班尹稚山亏空行款42万多两。北京、天津两分行在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时遭到焚烧抢劫，损失不貲。加上1903年日本人伪造通商银行钞票引起挤兑风潮，行款损失巨大，信用受到影响，业务急剧下降，不得不将已设立的分支行陆续裁撤，到1905年只剩下北京、汉口两处分行和烟台一处支行。这一时期，存款自1899年底的397万两下降到1904年底的189万两，放款自1899年底的582万两下降到1904年底的261万两。

第三阶段是回升阶段（1905—1911年）。从1905年起，部分铁路外债存款直接由通商银

行办理收存，成为该行存款的主要来源之一。根据帐册记载，京沪、京汉、粤汉、汴洛、沪杭甬几条铁路兴建费用的收支拨解都有一部分由通商银行办理，特别是沪宁铁路款项进出数字庞大，该路第一次外债借款 225 万英镑，自 1904 年起分三年拨付，通商银行在 1905 年争取到 25 万英镑存款，至年末，沪宁铁路在该行的存款高达银 254 万两，占全行存款的 2/3。1911 年 3 月，清政府为了偿还铁路借款，向日本横滨正金银行商定整顿铁路借款日金 1000 万元，这笔借款陆续付给清政府邮传部，而邮传部尚书就是盛宣怀，因此该部在通商银行的存款最高时达到 248 万两。随着存款增加和发行钞票的扩大，放款自 1904 年的 189 万两上升到 1911 年上半年的 800 多万两。在这一阶段中，通商银行贷给钱庄的放款也显著增加，1911 年上半年曾达 290 万两，占放款总额的 36%，同期汇丰银行贷给钱庄的放款为 880 万两，两者相比为 1 比 3，可见，通商银行对钱庄的资金融通是相当可观的。同时，通商银行还增加了对民族资本工商业的放款，据统计，这一时期与通商发生贷款关系的有大生纺织厂、大德榨油厂、天津贻来牟磨粉厂、龙章造币厂、华兴面粉厂等 14 家。当时钱庄对近代工业的放款为数极少，相比之下，银行与产业资本的关系比较密切。

通商银行业务的进展与发行银行券有密切关系。该行成立时，获得清政府户部批准，发行银元和银两两种钞票。银元券分 1 元、5 元、10 元、50 元、100 元等五种，银两券分 1 两、5 两、10 两、50 两、100 两等五种。这些票券是中国最早的银行券，一面是英文，一面是中文，并有聘请的英籍经理美德伦的签字，以示负责。在中文的一面印有“中国通商银行钞票永远通用”和“只认票不认人”等字样。从 1905 年到 1911 年的七年中，通商银行从发行钞票得到的利润达 80 万两以上。

商办时期的变化（1912—1935）

辛亥革命以后，通商银行的资本构成发生了显著的变化。该行原来的最大股东招商局拥有股票 80 万两，辛亥革命期间，由于江轮停航，营业锐减，资金困难，无力发放股息，就将持有的通商银行股票在 1911 年和 1912 年分两次全数转让给招商局股东，作为股息。通商另一大股东电报局所认购的 20 万两通商股票，早在 1898 年下半年就以分派股东股息的形式搭发出去。这样，招商局、电报局原有的通商银行股票就分散到为数众多的商股股东手里，除原来的官僚以外，工商业者的股份迅速多了起来。

同时，通商银行的当权人物也变动很大。盛宣怀在 1916 年逝世，自 1919 年开始，通商银行主要权力落到了该行董事傅筱庵（宗耀）手中。他当权后，首先在上海的虹口、南市设立分行，分别由他的心腹王心贯和当时的上海总商会副会长方椒伯负责。此外，还在宁波设立机构。

傅筱庵掌握通商银行大权以后，北洋政府为了筹措内战经费和维持行政开支，借助于发行公债，并以公债作抵，向银行借款。这种借款利率高，折扣大，傅筱庵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积极投靠北洋军阀，又贪图厚利，明知还款无保证，却甘于大量滥放，结果本息愈滚愈大，到北洋政府垮台时，帐面共欠本息 230 多万元，当然收不回来了。

1925 年 11 月，孙传芳军队进驻上海。傅筱庵除了运用通商银行的资金给予支持外，还利用他当招商局董事的权力供应船只，为孙运送军火和军队。在孙的支持下，傅筱庵于 1926 年

取代虞洽卿当选为上海总商会第六届会长。1927年3月，北伐军到达上海，傅筱庵被通缉，逃往大连。

傅筱庵出走后，通商银行大权掌握在傅的心腹王心贯手中。傅筱庵在上海时，与杜月笙、张啸林素有往来，虞洽卿虽与傅有矛盾，但经杜、张的拉拢，也顺水推舟，改变态度，与傅言和，并代为疏通，结果国民党政府撤销了对傅的通缉。

傅筱庵从大连回上海以后，于1932年5月召开通商银行股东大会，决定资本改以元为单位，按照每两以一元四角折算，改为350万元。6月，董事会改组，增添徐圣禅、朱耐寒、张啸林、杜月笙为董事，傅筱庵仍任董事长。

国民党政府建立后的最初两年中，通商银行业务进展不快。从1930年起，存款开始大幅度上升；达到1635万元，1934年上升到3100万元，为1929年的四倍多。

通商银行可以运用的资金来源除了吸收存款以外，主要靠发行钞票。傅筱庵从大连回来后，通过国民党政府财政部次长徐堪的关系，获得加发新钞的权利。1934年，发行额达到2900多万元，接近同期存款3100万元的水平。

随着资金来源的增加，通商银行的放款显著增长。1934年底放款余额3057万元，比1929年增长2.2倍。放款中相当一部分是以厂房设备或北洋政府发行的债券作抵，有些则根本没有抵押品，长期收不回来，但利息照结，滚入放款，呆帐越来越大。1938年6月底，通商银行放款总额为2200多万元，而26个大户的呆滞放款就达1276万元，其中北洋政府财政部呆欠230多万元，长兴煤矿公司、招商局和汉冶萍公司三个大户共呆欠500多万元。

在这种情况下，通商银行为了装饰门面，欺骗社会，竟不顾资金呆滞的严重情况，自1934年起，花了210万元的巨款，在上海江西路福州路口建造17层的营业大厦。到了第二年，即1935年，由于亏损太大，经杜月笙之手，将这所大厦以150万元的低价卖给宋子文组织的中国建设银公司。

1935年上海发生了白银风潮，通商银行出现挤兑危机。在四大家族授意下，由常务董事杜月笙出面维持，风潮平息。6月7日通商银行召开董事会，改推杜月笙为董事长，傅筱庵任常务董事。

1937年，通商银行正式改组为官商合办银行，资本额增定为400万元，将原有资本350万元按15%折合成商股52.5万元，另由国民党政府加入官股347.5万元，以复兴公债抵充。

官商合办时期的内幕

通商银行改组为官商合办银行以后，实权始终掌握在杜月笙手中。杜掌权以后，大量购进债券，1934年底，通商银行的有价证券只有314万元，1936年底上升到735万元。1937年7月，通商银行按80%左右的底价一次购进财政部发行的统一公债290多万元。其经营手法是在市场上逢低吸进，逢高卖出，有时在同一家证券号大进大出，有时则分别在几家证券号大量买进，而在另外几家大量卖出，借以避人耳目。通商银行经营公债投机得到了巨额利润，1937年证券盈利达37.8万元，占全行整个盈利151万元的1/4。

抗日战争时期，通商银行于1938年4月与四明、中汇两银行在香港设立联合通讯处。不久，将各地通商分支行的有价证券742万元运往香港，寄存在香港美国大通银行，同时将上

海大部分库存现金及一切重要单据、债券移存上海美国花旗银行。1941年7月，又从上海抽出150万元资金转移到重庆。同年9月，杜月笙派骆清华到重庆筹设分行，1943年6月改为总行，并先后在兰州、西安、洛阳、宝鸡、成都、自流井、衡阳、桂林等地设立分支机构，利用投资或贷款，渗入和控制各地的工矿企业。还调拨资金，组织运销公司，一面从敌占区购入日用品等运往内地，一面把内地的原料和农副产品运到敌占区，积累了不少外汇和黄金。

抗日战争胜利后，骆清华带了大量法币从重庆飞回上海，积极开展业务，因受中央银行委托代兑伪中储券的关系，存款一度回升，1945年底，达到19.8亿元，比1944年底增长四倍。

1946年下半年起，国民党为了发动全面内战，滥发钞票，造成物价急剧上涨，经济濒临崩溃，市场混乱，投机盛行，银行正常业务难以开展。这年10月，杜月笙以军统局预算尚未核定为由，指令通商银行贷款给军统局5亿元，占当时该行定期放款的1/3以上，因此通商银行资金不足时，军统局也予以调剂。1947年以后，每当上海通商银行资金紧张时，骆清华就专门派人到南京国防部二厅去拉存款，拿到了钱即时乘车带回上海抵用。

通商银行还投资文化新闻事业。到1948年底，通商银行投资的文化新闻单位有大东、世界、正友、文风等四家书局，上海商报、宁波商报、大晚报、新夜报、学生日报、金融导报等六家报社，以及中国新闻事业公司、天地新闻公司、中国出版社、江苏文化公司等单位。

通商银行在1937年以前承购了大量公债，到1948年底，还保留公债票面807万元。按照抗战前的进价，相当于黄金五六万两，但到1948年底只折成金圆券1.66元，等于一笔勾销。通商银行的资本和暗藏积累在恶性通货膨胀中，陆续被国民党四大家族及其代理人以假公济私、巧取豪夺的方式抽逃殆尽，到上海解放前夕，除了一些房地产以外，只剩下一个有名无实的空架子，留待人民政府接管。

解放后，人民政府接收了通商银行的官僚资本部分作为公股，改造成为公私合营银行之一。1951年5月，它同新华、四明、中国实业、建业等四行在金融业内首先组成联合总管理处。1952年12月，同上海其他59家私营银行、钱庄、信托公司一起组成统一的公私合营银行，成为我国社会主义金融事业的组成部分。

浙江兴业银行兴衰

尚其亮

浙江铁路公司与浙江兴业银行

浙江兴业银行成立于1907年，为我国最早的商办银行。它是本世纪初铁路风潮——拒款保路运动的产物，初为浙江铁路公司附设银行，称浙江铁路银行。

帝国主义为了掠夺我国资源，竞相掠夺我国铁路修筑权；清政府为了贪图外国铁路借款，不惜饮鸩止渴，出卖路权，这就激起全国规模的爱国反帝的拒款保路运动。浙江的保路运动发动较早，成效显著。1898年英使窦纳乐向清政府请准由英商承造苏杭甬等五条铁路之权，英商怡和洋行据此与清铁路总办大臣盛宣怀秘密签订向英借款修筑苏杭甬铁路的草约，但未能及时开筑。1905年，美商培次又来谋我浙赣路权。为了拒绝外款，自办铁路，1905年由汤寿潜发起，成立浙江铁路公司，汤寿潜任总理，刘锦藻任协理，立即公开招募铁路股款。清政府开始时是同意废约自办的，但英帝闻讯跳了出来，凭藉签有草约，施加压力，清政府屈服，只得向英借款。这就激起浙民的反抗，各地成立国民拒款会，群情愤激，甚至有两人身殉路，上至绅商，下至贩夫走卒，无不踊跃认购路股，至1907年10月认集铁路股款2300万元之巨，为英允借款数（150万镑，约合1000万元）的两倍多！至1909年，实收数已有925万元，为各省自筹铁路股款最快最多的一个省。

这么多的路款，保管和运用成了大问题。开始时存于沪杭30多家钱庄，支取十分不便。汤寿潜接受了刚从日本留学归来的蒋抑卮的建议，决定附设铁路银行。

银行与铁路业务毕竟不同，两者股权也容易混淆不清，所以决定把银行从浙江铁路公司中独立出来。1907年10月5日，取“振兴实业”之义，正式成立浙江兴业银行于杭州保佑坊。浙江兴业银行（以下简称“浙兴”）资本额为100万元，分1万股，每股100元。浙江铁路公司（以下简称“浙路”）投资占总股数在40%以上（一说占44.53%，一说占43.1%），余多系商人投资。商人中最大股东为蒋海筹，他还主动出资垫交股款；另为刘锦藻、周湘龄、张澹如、庞元济等也是股东，这些人都是著名丝商——南浔丝商豪富“四象八牛”家族的子孙，曾投资于缫丝业、造纸业、盐业和钱业等，他们又都是“浙路”的股东。

“浙兴”第一次股东大会选出董事为蒋海筹、孙向清、沈新三；查帐人为舒爱周、蒋梦莘；总司理为胡藻青。蒋海筹之子蒋抑卮回国后即继其父为董事。“浙兴”初期的掌权人物为蒋抑卮、胡藻青。

蒋海筹、蒋抑卮与汤寿潜是姻亲。蒋海筹，名廷桂，从一个织绸工、一台木机自产自销丝绸发展到开设蒋广昌绸庄，清光绪年间已在全国各大商埠设有多家分庄，1915年后，在杭州、上海创办绸厂，产销丝绸，积资300万元以上，为杭州最富有实力的丝绸商。长子玉泉，

早故。长孙康声，即是汤寿潜的女婿。康声有子彦武，后亦任“浙兴”董事；彦士，即今台湾国民党“总统府”秘书长，皆汤寿潜的外孙。蒋海筹的次子玉林，又名鸿林，字抑卮，在日本留学时，与鲁迅友善，曾资助鲁迅出书，回国后，正值汤寿潜总办浙江铁路，劝父投资“浙路”20万元。1908年继父任“浙兴”董事，1915年任办事董事，并举叶揆初为董事长。叶、蒋锐意革新，开创了“浙兴”的全盛时期。1940年蒋抑卮病逝，以其侄孙蒋彦武继任董事。

胡藻青，名焕，其父曾在汉口设有银号、当铺。胡家在杭州开设乾源金铺。杭州安定中学亦为胡家所创办。

沈新三，名铭清，平湖人，浙江铁路公司董事，浙江兴业银行发起人。1910年，举为董事，兼任杭州大有利电灯公司总经理。沈对该公司兴利除弊，一年后转亏为盈，不受酬报，旋即辞去。后因病于1929年逝世。沈精书法，“浙兴”招牌及兑换券上题字，皆其手书。

蒋孟莘，字汝藻，湖州南浔丝业巨商蒋家之后裔。他又是著名的藏书家，对版本甚有研究。汤寿潜之子韦存在南洋柔佛办明庶农业公司，种植橡胶。其资本除其兄拙存（创办光华火柴厂）出一部分外，其余即由蒋孟莘与蒋抑卮分担。他既是“浙路”股东，也是“浙兴”股东。1914年交通部与浙路订定收归国有合约时，他是浙路公司代表。

1908年，“浙兴”设上海、汉口两分行。樊时勋为上海分行经理，盛竹书为汉口分行经理。

樊时勋，名菜，原为“宁波帮”巨商叶澄衷的总管家。叶澄衷经营五金业起家，后投资沙船、缫丝、火柴等业，积资800万两。樊在沪交游广阔，与张謇、汤寿潜、叶揆初均有交谊。

盛竹书，镇海人，幕友出身，在上海创办泰东面粉厂，1916年樊时勋病故后，盛由“浙兴”汉行经理调任沪行经理。1922年因交通银行上海分行经理钱新之升任总行协理，由该总行总经理张謇推荐盛竹书任交通银行上海分行经理；因盛深得同业的信任，又被公推为上海银行公会会长。

“浙兴”初期，主要为“浙路”公司服务，兼营一般存放业务。上海分行之设立，除为了收存路股外，还为了便于在沪采购铁路所需物资。汉口分行之设立，除要在华中招徕路股外，还想投资汉阳铁厂，以期解决“浙路”所需钢轨的供应问题，沪杭甬铁路于1909年8月13日沪杭段全线建成通车，工费之低，质量之高，为中外所公认，这也有“浙兴”的一份贡献。

“浙兴”为最早取得发行钞票之权的少数几家银行之一。1911年后一度停止发行，向中国银行领券，1922年又重新发行。到1934年底，“浙兴”钞票发行额为921.5万元。

“浙兴”一开始就以稳健作风著称，几次金融风潮都能平安渡过。1911年金融风潮，因10月10日武昌起义而谣传“汉口的浙兴分行倒闭”，以致引起杭州和上海持有“浙兴”钞票者纷纷挤兑银元的风潮。“浙兴”除蒋抑卮出私财以济急之外，又向任两浙盐运使的股东周湘龄呼救，向盐运使署借到35万元，才平息了杭州的挤兑风。11月4日浙江光复，汤寿潜当了浙江都督，“浙兴”又向他求援，恰好江浙联军出兵打南京，需以银元发饷，汤便让“浙兴”上海分行也承担代为兑换银元的差使，当一箱箱银子由浙江运到沪行时，挤兑者一见放了心，自动散去，上海的挤兑风也平息了。在1911年的金融风潮中，票号几乎全部覆没，钱庄也倒了，一大片，银行如信成银行等也倒了。“浙兴”却渡过了难关。

叶揆初、蒋抑卮合作开创全盛之局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西方帝国主义忙于参战，无暇东顾，我国民族资本有了发展的机会。而这时的“浙兴”，杭州本行及沪、汉两分行，各自为政，权力分散，形不成力量。为此，由这时已为“浙兴”股东的叶揆初与蒋抑卮共同商讨对策，决定“浙兴”实行大改革，以便集中统一事权。

在一次股东大会上，改选叶揆初、蒋抑卮、樊时勋、胡藻青、周湘龄、张澹如、王湘泉为董事；其中又推叶、蒋、樊为办事董事，作为领导核心；又推叶为董事长，全权负责。从此开始了叶揆初、蒋抑卮的合作当权达30年之久的局面。董事会下设总办事处于上海，以项兰生为办事处书记长。上海分行改为本行，樊时勋为经理，后由盛竹书继任；杭州本行改为分行，由张笃生为经理；汉口分行仍旧，又增设北京、天津等分行至数处支行。1921年以后，先后增加了徐寄庠、陈叔通为办事董事，参予领导工作；徐新六继项兰生任总办事处书记长。1923年，总办事处制改为总行制，上海本行改为总行，董事长叶揆初兼总经理，徐寄庠、徐新六为协理。1926年，叶不再兼任，由徐新六任总经理，徐寄庠仍任总司库。

叶揆初，名景葵，杭州人。早年景慕维新，曾读于张元济所设的通艺学堂，30岁中进士，受知于赵尔巽，为赵所重用。赵任东三省盛京将军时，叶任财政局会办。时“浙路”招股，汤寿潜经樊时勋之介，曾托叶募得路股11万元。浙江兴业银行筹办，又托他为银行募集股本，他本人投入股金5000元，成为股东。1907年江浙工商界派一代表团赴汉，调查对汉冶萍公司投资的可能性，“浙兴”蒋抑卮等也参加。经汉阳铁厂经理李一吟的介绍，蒋抑卮等结识了正在武汉的叶揆初。后赵尔巽任四川总督，派叶任四川驻沪转运局总办，叶到上海，得与樊、蒋朝夕相处，有时列席董事会，一度遥领汉口分行经理。1911年初，叶赴京出任大清银行监督，辛亥革命时去职回沪，任“浙兴”董事。1914年“浙路”收归国有，叶被选任“浙路”清算处主任。“浙路”原投资于“浙兴”的股份应退出，即由蒋抑卮等收购。叶与蒋的合作关系由此而形成。

徐寄庠，名陈冕，永嘉人，日本山口高等商业学校毕业，曾任中国银行兰溪、九江支行经理。到“浙兴”后，曾任沪行经理、总行协理、总司库、办事董事等职。1932年，当孙科出任国民政府行政院长时，中央银行总裁宋子文、副总裁陈行辞职，徐寄庠一度任中央银行副总裁兼代总裁，仅一个多月即去职，仍回“浙兴”。1939年徐主持上海市商会，太平洋战前，移港办公，香港沦陷后被敌押送回沪。他坚不事敌，并曾参予说服高宗武反戈一击，公布日汪卖国密约，有力地打击了投降活动。对这件事，当时在重庆的周恩来十分赞赏。1945年抗战胜利，徐以政府特派员身份接收上海伪商会和伪银行公会。1946年，出任“浙兴”董事长，兼任上海总商会理事长、中国银行董事、中央银行监事等职。

陈叔通，名敬第，杭州人，26岁中进士，曾入翰林院，后加入光复会，又留学日本，读于法政大学。民国成立后曾任国会议员，后又参加反袁称帝斗争。不久退出政界来沪。因陈与商务印书馆的张元济为知交，被聘为该馆董事。这时叶揆初也兼商务印书馆的董事（陈叔通是叶的表姑丈），有此一层关系，叶即邀陈到“浙兴”来，不久被举为办事董事。他一度兼“浙兴”扩展部部长，负责扶持民族工商业的工作。

徐新六，余杭人，为曾任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所长的徐珂的儿子，留学英国和法国，回国后任职北洋政府财政部，又任教于北京大学。1917年任财政总长梁启超的助手，后进中国银行任金库部副主任及北京支行协理。1920年随梁启超遍游欧州。在“浙兴”总经理任内有所革新：采用西方银行方式发展业务；成立储蓄部和房地信托部；与美商斯达莱公司合作成立泰山保险公司等。1938年国民政府拟派他为赴美争取经援的代表团代表，在8月24日所乘飞机由香港飞桂林赴渝途中，被日军击落，徐殉难。

这时，“浙兴”可谓人才济济。集著名金融家于一堂，均为一时之彦。著名经济学家马寅初亦曾出任“浙兴”金融研究所主任之职，叶揆初很尊重他，定要拜他为师，而且态度是认真的，曾订有师生协议一纸。虽然因双方都是忙人，协议执行时间不长，马寅初不久也离开“浙兴”；但马对“浙兴”始终是怀有深厚感情的。

“浙兴”全盛时期的1915年到1931年间，发展很快。1915年实有资金为50万元；1917年，收足资本100万元；1920年增资至250万元；到1931年，资本总额增殖到400万元，16年间增加8倍，这在旧中国商办银行中算是发展很快的。当时“浙兴”和浙江实业银行、上海商业储蓄银行被列为有实力的“南三行”（或加上新华信托储蓄银行称为“南四行”）。特别是1915到1926年，“浙兴”的存款直线上升。1926年存款余额已达3312.1万元，连续多年在商办银行中居第一位。1915年到1926年合计纯收为371万元，平均年盈利率为15.8%。

“浙兴”与中国银行沪行关系密切，在“浙兴”一度停止发行兑换券期间，领用中行兑换券及往来存款在150万元以上，高时达300万元。

1916年，袁世凯为了恢复帝制，动用公款，致使国库空虚，中交两行库存被挪用，乃下令中交两行停止兑现。此令一出，中国银行上海分行经理宋汉章决心不受此项命令，乃与“浙兴”叶揆初、蒋抑卮等密商对策。“浙兴”因在中国银行领券最多。如果停兑，将难以维持信用，故坚决支持宋的立场；而且“南三行”都是中国银行上海分行的商股股东，关系密切，立场一致。但拒不受命亦必须极为审慎，应有法律根据，不能被袁政府抓住把柄，反咬一口。为此，他们组织了“中国银行商股股东联合会”，抬出张謇任会长，叶揆初任副会长，由该会聘请律师接管上海中行，再由律师委托宋汉章、张嘉璈继续营业；由“浙兴”集中资产，向各钱庄抵押借款（不用中行资产押款），秘密支持上海中行备足现款，应付挤兑。这样，上海中国银行在抗拒停兑命令中照常兑现，终于很快平息挤兑风潮，声誉鹊起，信用大增，其影响所及，除京津外，各地中行也都不受乱命，照常兑现，此事对于稳定全国金融市场起了重大作用，而“浙兴”从中作出了重大贡献。

扶助民族工业 投资钱江大桥

“浙兴”是名副其实的以振兴民族工商业为宗旨的。当时比较著名的民族工商企业几乎都与它发生关系，不少企业受它扶持，赖以摆脱困境。当然，别的银行也扶助民族企业，也有较深关系。民族金融业与民族工业的这种关系，反映了中国民族经济在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压迫下休戚与共、命运相倚的景象。兹就“浙兴”与民族工业的关系举例如下：

有“中国第一位实业大王”之称的张謇，1899年所创办的大生纱厂开工生产，当时实收股本44.51万两，全都用于固定资产，还不够数，营运资金全靠借贷周转。原有两人答应各

投资 25 万两，一人愿以设备作价，不料却是一堆破烂废物，一人说好投资现款，中途又生变化，未能成议。此时张謇到了“仰天俯地，一筹莫展”之境。1907 年浙江兴业银行成立，沪行经理樊时勋，乃张謇友好，张遂到沪向樊要求支援，樊在银行资金并不宽裕的情况下，仍贷予 25 万两，使得大生纱厂充实了营运资金，终于“柳暗花明又一村”。自此“浙兴”对大生纱厂经常放款，每逢张謇告急求援，“浙兴”总不回绝。1918 年初“浙兴”在上海的北京东路江西路口新屋落成时，张謇特地到行祝贺，曾致颂词说：“浙江兴业银行之分立于上海，十有一稔矣。创始之时，樊君时勋之力最多。余与樊君交二十年，在余经营大生纱厂，艰苦百折，能慰藉而作余气者，樊君其一。樊君主持银行时，南通实业稍稍振起矣，推心置腹，相与酬济，亦有数年，始终相信重。”（1918 年 2 月《银行周报》）“浙兴”对大生放款，以 15 万两为度。1917 年 2 月，“浙兴”与上海银行合借大生 25 万两。1919 年 2 月，借 5 万元，次日又借 5 万元，均抵押借款；1920 年 1 月，又透支 5 万两，1922 年，“浙兴”与中南银行合借大生 65 万元（见《浙兴琐谭》）。

湖南聂璐生的上海恒丰纱厂（前身为 1891 年官督商办的华新纺织新局，后归聂缉槩所有，改名恒丰纱厂，璐生系聂缉槩之子），是中国近代纺织工业最早创办的工厂之一。它也是“浙兴”重点放款户。这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颇为兴旺的大厂，大战之后，日趋困境，开始时向钱庄借款，钱庄无力承担；后又向沙逊洋行抵押借款，这家帝国主义的洋行见它毫无起色，便逼迫收回借款；它最后求助于“浙兴”，1929 年“浙兴”对它放款 240 万两，给它打了一针强心剂，1930 年恒丰纱厂转亏为盈。但好景不常，由于纺织品价格连年下跌，至 1935 年终于亏蚀达 200 万元以上，不得不宣告停业，而当时积欠“浙兴”已达 400 万元之巨。“浙兴”商得聂璐生的同意，只得把恒丰出租给官僚资本的中棉公司经营。到了 1938 年，在日军的铁蹄下，恒丰被日方接管，指定为军管工厂，遭受了破坏和掠夺，而这时恒丰欠“浙兴”的借款达 559 万元，成为呆帐。到 1943 年，日军发还恒丰，由聂家与日商“合办”，聂家才拿到日方少得可怜的钱，偿还“浙兴”债务。“浙兴”原值 4 万两黄金的巨额借款，这时所得的只值 1000 两黄金的清偿！对“浙兴”来说，这样赔钱的事，不是仅此一桩。

被称为“火柴大王”、“企业大王”的著名民族企业家刘鸿生，更与“浙兴”结下了不解之缘。他们之间的关系，更生动地说明了民族工业和民族金融业在帝国主义和官僚资本的双重压迫下相互依存、艰苦挣扎的命运。

刘鸿生创办的大中华火柴厂，抗日战争前是全国最大的火柴工业，所产火柴占全国火柴总产量的 15%。1931 年前后，“浙兴”对它的放款额度为 100 万元。到 1934 年时，由于统税增加，日本火柴走私，产量锐减，该厂以及刘氏其它企业已积欠“浙兴”250 万元。1935 年，刘氏企业更陷困境，外面已谣传“刘鸿生要倒”。刘不得已，去找宋子文商量，希望能将全部财产抵押给中国银行。据刘自述：那真是他一生难忘的一个夜晚！宋忽然改变了面孔，问：“你用什么作抵押呢？”刘答：“我全部企业的股票！”宋哈哈大笑地说：“O. S.（刘名字英文缩写）的股票如今草纸都不如了！”后来还是“浙兴”继续给予贷款 250 万元。抗日战争时期，大中华七个火柴制造厂和一个梗片厂，先后遭敌破坏和掠夺，日方多次表示要与刘鸿生“合作”，都被刘所拒绝。而这时“浙兴”对刘鸿生所属企业还有放款 270 万元未收回，也陷于呆滞状态之中。

陈万运和沈九成所创办的三友实业社，也是“浙兴”的放款大户。三友实业社三个朋友

仅以 450 元的小本起家，惨淡经营 20 年，成为拥有两个大厂、14 个工场、37 个发行所的民族企业。但是，1932 年一·二八，日军首先向“三友”上海引翔港总厂挑衅，发动了侵华的一·二八事变，总厂遭严重破坏，“三友”的生产重心转移到杭州拱宸桥分厂。杭州分厂是 1929 年盘进原通益公纱厂而成立的，虽经扩建，而资金短绌，出现亏损，所欠中国银行的 200 万元也还不出。在中行催讨下，“浙兴”向它伸出援助之手，1934 年，“浙兴”借给 200 万元偿还中行旧欠，赎回抵押单契，三友实业社即以此项单契及杭厂资产向“浙兴”作抵押借款。抗战开始后，日方多次引诱陈万运参加“中日合作”，以恢复生产，陈断然拒绝。“三友”杭厂一直度日艰难。最后，陈万运“山穷水尽”，作出了个使他终生悔恨的决定：把“三友”杭厂以 630 万元出卖给了上海国华公司，除了归还“浙兴”借款本息 250 万元外，只得到 380 万元，而杭厂实际价值却为 2000 万元（伪中储券）。

穆藕初创办的郑州豫丰纱厂，荣宗敬、荣德生创办的福新、茂新面粉厂，也是由于“浙兴”的支持而得到发展。

朱谋先创办的杭州纬成丝业公司，也是“浙兴”的放款大户。朱谋先和许炳坤等人于 1912 年集资 2 万元创业，到 1923 年资本总额已达 240 万元，资金增长 120 倍之巨！所产白厂丝出口额，一度跃居全国首位。但是 1929 年世界经济危机开始，国外丝价下跌，加上日丝的竞销，尽管“浙兴”及其他银行放款支持，终于在 1932 年以资金周转不灵，宣告停业清理，负债达 130 余万元，分欠“浙兴”、“中国”、“交通”和浙江地方银行等。“浙兴”为维护事业，以主要债权人之一的身份，主持清理债务。由债权银行组成经租委员会，将公司所属各厂固定资产出租或部分标卖，以清还债务。

湖州的公益丝厂，“浙兴”也常给予贷款。1920 年该厂陷于困境，宣布清理，通过“浙兴”转让予周湘龄接办，改名为模范丝厂，继续向“浙兴”借款。到 1932 年，又因受丝价惨跌的冲击，无法维持，请以固定资产抵偿“浙兴”债务，“浙兴”允暂予接管，不久作价盘给菱湖章荣初接办，更名为合丰丝厂（即今湖州丝绸厂之前身）。

在重工业方面，“浙兴”一开始就很重视。汉冶萍公司，1890 年张之洞创办；1896 年清政府派盛宣怀改为官督商办；1908 年改为商办（实权仍操盛手）。当时“浙兴”曾想投资，未果。由于曾任汉阳铁厂经理的李一吟（维格）是叶揆初的好友，1912 年，叶揆初与李一吟同任汉冶萍公司经理。“浙兴”也向之放款，1922 年至 1926 年对汉冶萍的放款最高额度为 50 万两。

山东中兴煤矿，为张毓渠（莲芬）所创办。张曾任山东盐运使，系叶揆初岳父朱钟琪的好友。“浙兴”1922 年至 1926 年对中兴煤矿的放款最高额度为 40 万两。1931 年，中兴煤矿选叶揆初为董事长。

“浙兴”对长兴煤矿、北票煤矿等等的放款额在 7 万两以上。

范旭东创办的永利碱厂也是“浙兴”的放款大户。

在商业方面，上海的商务印书馆、杭州的蒋广昌绸庄、胡庆余堂国药号，均为“浙兴”的放款大户。

从上面所举的一些事例可以看到，中国近代比较著名的民族企业，都曾得到“浙兴”的资助而取得发展，当这些企业面临困难时，它又竭力解救，或同受损失。据统计，在上海 13 家主要商业银行对于工矿企业的放款中，“浙兴”所占百分比：1930 年为 25.6%，1933 年为

26.4%，1936年为14.6%，均列前茅。在得到“浙兴”放款的600余家企业中，有20余家得到解救。虽然它在1928年后存款额从第一位逐步降到第六位，实力下降了，但它对民族企业的放款却有增无减。这确实是难能可贵的。怪不得刘鸿生不止一次地慨叹：“浙江业兴银行才是我们企业自己的银行。”

这里要特别提一下“浙兴”承借巨款修建钱江大桥的事。钱江大桥是在茅以升主持下兴建的我国自己设计和施工的第一座现代化大桥，当时任铁道部长的顾孟余采纳浙江省建设厅长曾养甫的建议，决定修筑此桥，要求银行贷款以支持建筑费用。叶揆初和徐新六考虑到当初浙路公司造沪杭甬铁路时未及兴建钱江大桥，所以对此议极表支持，首先响应，并由它邀请“中国”、“浙实”等银行参加，组成造桥贷款银团，共同投资200万元，“浙兴”自认其半，即100万元。钱江大桥于1937年9月建成通车，为支援抗日战争作出了重要贡献，这也有“浙兴”为争取民族生存所作的一份贡献。

四大家族官僚资本的压榨和吞噬

“浙兴”为什么会从兴盛走向衰落？一个主要原因是受蒋介石四大家族官僚资本的压榨和吞噬，尤以1927年和1935年为烈；抗战时又受日本侵略者的掠夺；1945年更受国民党的“劫收”之害。

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事变，江浙资本集团曾拿出钱来支持他。蒋上台后又向他们伸手要钱，办法是发行“江海关二五附加税国库券”3000万元（后又续发4000万元），强行摊派给银行、钱庄两业认购，“浙兴”被派到认购数100万元（后减为40万元）。“浙兴”对蒋介石这种强制勒索作风十分不满，叶揆初坚不同意此认购数，只勉强认购25万元，国民政府当然通不过，关系弄得很紧张。经人劝说，叶揆初不得已，加了5万元，凑足30万元交了上去。哪知这一下触怒了蒋介石，他拍案大骂：“它不帮我，我叫它关门！”并令将30万元退还。因为“浙兴”在各商业银行中地位一向较高，蒋怕别的银行效尤，故对它散布流言大施压力。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总经理陈光甫这时又来当说客，劝“浙兴”让步，叶揆初感到“孤军对抗，颇非所宜”，终于不得不认购40万元了事。而在这次摊派中，与“浙兴”叶揆初关系密切的中兴煤矿，因拒绝认购100万元而被蒋介石下令没收，经设法满足其要求后才得归还。长兴煤矿也于这时被国民党借故占有，到1932年才得赎回。“棉纱大王”荣宗敬因营业不振，拒购库券，蒋介石竟密令无锡县政府查封其财产，通缉荣氏，后经吴稚晖等疏通，认购了50万元才算了结。

从1927年以来，“浙兴”当权者对四大家族官僚资本心存抵触戒备。其他一些银行的负责人都力图靠拢四大家族，有的还做了官，唯独“浙兴”的人从未出任一官半职。由于依附关系的不同，业务发展也就不同，所以1927年前“浙兴”存款常居第一位，而1927年后逐年退下来，1931年退为第四位。至1936年已退至第六位了。

1927年后，“浙兴”企图为资金运用寻找新的途径，成立地产信托部，投资于房地产，聘请蒺延芳为这个部的经理，由总行划出资本50万元，经营房地产，到1932年时，就已盈余128万元。由于剩余资金得到一稳妥的消纳之途，帐面房地产金额已达800—900万元，“浙兴”成了“房地产大王”。但是，好景不常，1932年一·二八以后，由于日军的侵略炮火，房

地产无人问津，业务一落千丈。于是黄延芳觉得“与其产业荒置坐耗利息，不若赶快施工建筑，收取相当之孳息之为得计”，先后在今山阴路、淮海路、溧阳路造了兴业坊、兴业里、浙兴里等房屋，以出租来补投资的损失。

1935年后，“浙兴”为了避免法币政策带来的损失，筹设“中国投资公司”，将资金转移国外。到1941年共转移资金约合393万美元，可是由于外汇投机失利和主其事者的侵吞，损失达177万美元。1941年后，美国对中国在美资金应蒋介石之请实行冻结，“浙兴”在美外汇资金亦被冻结。

1935年，国民政府为了垄断货币发行，于11月4日实行币制改革，规定以中央、中国、交通三行发行的钞票为法币，不得行使现金，违者没收；其他银行不准再发行钞票，其已发钞票连同准备金，悉数上交。“浙兴”是最早取得钞票发行权的银行之一，而且自从1922年办事董事之一的徐寄庾主持总司库时，坚持发行钞票的准备金必须十足。当时几乎所有银行都不愿多以现金作准备金，认为这样会减少资金的运用，因此一般发行钞票都以现金四成债券六成作抵，唯独“浙兴”以现金六成以上作准备金，其余不到四成才以债券作抵。这时对国民政府的“法币”政策，无可奈何，只得将发行准备金悉数上缴，计现金595万元，保证准备金350万元，两项合计945万元，在官僚资本的掠夺下，“浙兴”资力削弱了1/10。

敌伪的掠夺和国民党的劫收

1932年日本发动一·二八事变，民族工业首当其冲；1937年八·一三侵略战火扑向沪宁杭，民族工业受到毁灭性的打击，上海租界成了“孤岛”；1941年太平洋战起，“孤岛”也沦陷了。“浙兴”在抗战期间，撤退了苏州、无锡等十余个分支行，增设了重庆、昆明、香港等分支行，而总行始终在上海苦撑残局，京、津、汉、杭等分行业务也一蹶不振。

抗战期间，“浙兴”受到敌伪的掠夺，损失不赀。光是由于民族工商业之遭破坏，“浙兴”的工业放款，大都成了呆帐。如恒丰纱厂、刘鸿生企业、天津永利碱厂、三友实业社及汉口第一纱厂，仅此五家，呆滞的放款即达1400万元以上。先是国民党“法币”、继之又是日伪的“中储券”之通货恶性膨胀，“浙兴”损失尤大。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了，但是对民族金融业却是更大的打击。当时1元“法币”相当于伪“中储券”35元，但国民党政府却人为地提高“法币”比价，定为伪“中储券”200元作“法币”1元。“浙兴”当时资本为伪“中储券”1000万元，兑换成“法币”只剩得5万元，不得不继续增资补充到“法币”1000万元，实际资金运用能力大大削弱。

“法币”发行额，1945年以后以天文数字激增，国民党政府1948年8月19日终于不得不宣布“法币”的崩溃，发行“金圆券”，按1比300万的兑换率收兑“法币”，同时限期收兑人民所有的黄金、白银及外币，限期登记人民存放国外的外汇资产。“浙兴”所存外汇资金已极有限，不得不忍痛将历年仅有的积累移于中央银行，大约有各种外汇折合美金55万余元及各种外币公债券和港币股票等，如此多次折腾，“浙兴”几乎到了罗掘俱空的地步。

抗战胜利以后的几年中，美帝国主义商品的大量倾销、官僚资本的加强垄断，加上国民党反动派的反人民内战，民族工业奄奄一息，民族金融业也无法进行正常业务活动，不得不以参予金融投机活动来过日子，“浙兴”自也不能例外。

体制渐露弊端 人事发生纠纷

“浙兴”之所以走下坡路，主要原因已如上述。除此之外，还有其内部原因：在体制上，董事长全权独揽，在其前期固可救权力分散之失，而到后期，因权力过分集中，且30年中，叶揆初一人任此职到底，遂生出种种弊病来。首先使总理事必请示，不能有所作为，如徐新六，是金融界不可多得之人才，但迄未能一展宏图。叶揆初对蒋抑卮也因故而生矛盾，使叶、蒋长期合作之局面产生裂痕。更糟的是叶用人不当错用了竹××，使“浙兴”大受损失。竹利用叶的信任和所得的职权，培植亲信，侵占行产，其手法：一是低价套购“浙兴”的外汇资金，使160万美元有去无回！二是对“浙兴”房地产营私舞弊。当1941年太平洋战起，房地产跌价，他却擅自脱售与他的同伙，抗战胜利后房地产大涨，董事会方以为可赚到一笔，哪知都已落入他那一伙之手！其三，是假手别人收购“浙兴”股票，企图掌握大量“浙兴”股票，把蒋家排挤出去。这时，蒋彦武已继承1940年病故的蒋抑卮而为董事，他和别的董事对竹的举止大起恐慌，叶揆初也如梦初醒。1943年在增资时，从历年盈余中分给原董事认购股权，才使竹的股权相对削弱，从而巩固了叶、蒋原董事的地位。董事会开会，叶下令撤了竹的职务。

支持民主运动 接受社会主义改造

1938年“浙兴”总经理徐新六遇难后，由项兰生之子、天津分行经理项叔翔继任总经理。项兰生是叶揆初的幼年同学，两人关系甚好。其子项叔翔，清华大学毕业，到“浙兴”后曾奉派赴英、美留学，实习银行业务，为人自奉菲薄，待人宽厚，倾向进步，抗战胜利后曾在经济上支持进步刊物《经济周报》及《民主》（郑振铎编）、《周报》（柯灵、唐弢编）等。

1945年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府对“浙兴”除了经济上的压迫外，还在政治上找岔子，曾多次派人前往调查，企图达到某种目的。叶揆初为了避免麻烦，就辞去董事长职务，退居幕后，而由办事董事徐寄庾继任“浙兴”董事长。因徐寄庾这时正担任着苏浙皖处理敌伪产业审议委员会委员等职，由他出任董事长，可以应付国民党可能给予“浙兴”的威胁。

在蒋介石国民党军事、政治、经济面临全面崩溃的前夕，民族金融业深受其祸害而走投无路，在中共政策的感召下，“浙兴”上层人物不能不考虑对人民民主革命的态度。

早在抗战期间，叶揆初与陈叔通、张元济等创办“合众图书馆”于上海。1945年后由叶主持这个图书馆的工作。图书馆收藏有马列和毛泽东的著作以及解放区出版的杂志。他们已在秘密地研究中共的方针政策，以决定其今后行动了。

1947年6月3日，由陈叔通起草，叶揆初、项兰生、胡藻青等社会知名人士十人署名的给上海国民党政府当局的信，报界称之为“十老上书”，支持上海及全国学生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的民主运动。信中责斥反动派“纪纲荡然，令人惊骇”，要求“将被捕学生速行释放”。

1949年1月19日，陈叔通接受中共中央邀请，赴港转往解放区参加新政协筹备工作。